

福建历代名人篇丛书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 编

福建歷代名篇選讀

郭丹 主编
朱晓慧 副主编



(上·诗词卷)

福建历代名人名篇丛书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 编

福建历代名篇选读

郭丹 主编
朱晓慧 副主编



(上·诗词卷)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HAIJIAO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JIAO WENYI PUBLISHI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历代名篇选读. 上, 诗词卷/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编; 郭丹主编.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8. 9 (2019. 4 重印)

ISBN 978-7-5550-1643-4

I. ①福… II. ①福…②郭… III. ①中国文学—作品综合集—福建②诗词—作品集—中国
IV. ①I218.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4086 号

福建历代名篇选读(上)·诗词卷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 编

主 编 郭 丹

出 版 人 林玉平

责任编辑 李永远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 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 350011

厂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72 千字

印 张 39.5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643-4

定 价 138.00 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福建历代名人名篇丛书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陈立华

编委会副主任：肖贵新

编 委：翁孟武 郭 丹 林玉平 林 滨

主 编：郭 丹

副 主 编：朱晓慧 祁开龙

责任编辑：余明建 李永远

编者的话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

福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福建文化以多元、深厚、交融的鲜明特征而著称。文化形态各具特色、交融互动，文化名人璀璨夺目、流芳千古。福建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福建的独特标识和八闽儿女的精神命脉，是福建值得骄傲的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福建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组织实施福建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十大行动”，大力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各级党委和政府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纳入精神文明创建考核评价体系，通过顶层设计和项目带动，努力把福建建成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基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持续兴起“大学习”热潮，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加快福建文化强省建设，为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福建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精准把握福建优秀传统文化脉络，深入了解福建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这笔宝贵财富，我们专门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福建历代名人名篇”丛书。丛书包括《福建历代名人传》和《福建历代名篇选读》两种，前者梳理福建历代名人的行迹，总结福建历代名人的优秀品格，诸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扶危济困”的公德意识，“三省吾身”的自省自警自律意识，既是传统优秀文化的精义所在，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吻合；后者精选福建历代诗文名篇，引导读者通过阅读陶冶情操，树立核心价值理念，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涵养中华人文精神和美学思想。

经过专家学者和编辑同志一年多的努力，“福建历代名人名篇”丛书终于要付梓了。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对福建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所助益。

本书编委会

2018年10月

前言

一

福建历史悠久，逾五千载，东濒台湾海峡，山水人文之盛，世所共知。不过，就诗文创作来说，福建则起步较晚，在初唐之前，还未有作家出现，未有作品留存。这与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有关。在交通、信息不畅的古代，福建这样的地理环境势必影响了与中原的深入交流和同步发展。但是，福建地区一旦与中原交流沟通，便以坚实的步伐加快了中原化的进程。中唐以降，闽人重学兴教，随之而兴的诗文创作，虽为肇始之期，却是一鸣惊人，直追中原。两宋时期，文教昌盛、理学勃兴，诗文创作进入绚烂辉煌的繁荣期。明、清二代，诸学并起，佛、道、医、艺，超越中原，形成“闽学”之大观。虽不乏复古之旋律，但是诗文创作人数众多，风云激荡，变幻多姿。福建历代乡邦文献，亦堪称彬彬其盛，光华璀璨。就以“四库全书”所收 3500 多种图书来说，有关福建文献及研究福建文化的著作，共计 330 多种，差不多占所收典籍的十分之一。如果加上存目，总数近 800 种^①。而集部的数量，连存目计算在内，大约有 300 部之多^②。集部数量之多，说明福建历代作家之盛。再从诗人的数量来说，据王兆鹏先生统计，唐、宋两个朝代全国各省的诗人情况，盛唐时期福建地区时代和籍贯可考的诗人只有 4 人，到了晚唐，则有 40 人。北宋时期，福建诗人大增，由整个唐代的 91 人增加到 529 人，较唐代增加了约 4.8 倍。整个宋代，福建诗人的数量有 1067 人，仅次于浙江跃居全国第二^③。这说明福建的文化在两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此后，延及明清时代，以至近现代，福建的诗

文创作仍然长盛不衰。今天，我们鸟瞰福建历代诗文创作，不论是作品创作，还是理论探索，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居于潮头的上乘表现。下面，即以朝代为依据，分几个阶段加以概述。

一

唐代初期，因远离中原，在中原人眼里，福建还是“南蛮”地区，似乎处于落后状态，文化亦不发达。但是，唐以前，已有一批中原或北方作家诗人游宦闽地，如六朝时期的江淹、王僧儒、范缜、萧子范等，他们为宦当时的晋安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实际上在两汉六朝时期，与闽地毗邻的浙地，已经涌现了一批著名作家，如沈约、孔稚圭、丘迟以及出任永嘉太守的谢灵运等。浙、闽两地虽受到横亘在西北方向连绵不断的武夷山脉的阻隔，但是交通与交融还是不断的，像《李寄斩蛇》这样流传在闽地的故事，能够被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收录，印证了浙、闽两地文化的交流和碰撞^①。

就文献留存的角度来说，福建诗文创作的发生期，乃从唐代开始。然而虽是肇始期，却可谓“发唱惊挺”，显示出闽人创作自有的面貌，表现出不俗的成绩。唐代的诗人作家，首先引人注意的是闽人第一位进士薛令之。薛令之，闽地长溪（今福安市境内）人。这个唐中宗神龙二年（706）的进士，《全唐诗》录其《灵岩诗》和《自悼》两首。虽然仅有两首，却是闽人进士及第之后留下诗篇的第一人。唐代闽人作家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是欧阳詹。欧阳詹的故乡，在今天南安市码头镇大庭村的高盖山下。欧阳詹在贞元八年（792）与韩愈、李观等人同科登进士第，与韩愈是至交，有诗相唱和。欧阳詹与韩愈同科登第，其古文受到韩愈的称赞，韩愈称其“切深、往复、明辨”，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欧阳詹死后，韩愈作《欧阳生哀辞》以悼。这些，都说明闽人作家与中原作家在艺术水平上已经基本同步。欧阳詹似乎以文传世，他的《甘露述》《则卞和述》《泉州北楼记》等都是名篇，有《欧阳行周文集》十卷行世。欧阳詹在有唐一代闽人作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此外，据《全唐诗》和补编的统计，唐代福建诗人存诗较多的还有徐夔（或作寅，《全唐诗》作夔，《唐才子传》作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寅；267首）、黄滔（209首）、陈陶（185首）^⑤。唐代福建作家创作，已经在全国的诗文创作中崭露头角。

相对于宋代福建作家的异军突起，晚唐五代似乎是一个过渡阶段。不过这个过渡阶段也出现了好几位有成就的作家。王棨、黄滔、徐夔三人被称为晚唐律赋三大家。王棨的《江南春赋》，既抒写江南丽日和煦的春景，又暗讽六朝故地，覆亡之痛^⑥。王棨是晚唐写律赋最多的一个人。他的作品中写个人感受的也最多，是一个颇具开拓精神的赋家。黄滔被后人誉为“闽中文章初祖”，其作《馆娃宫赋》写馆娃宫盛极而衰，告诫为人君者应以史为鉴，与王棨《江南春赋》用心一也。他的《莆山灵岩寺碑铭》写的是莆田南山广化寺，文中介绍灵岩寺的由来、历史和现状，追述与灵岩寺相关的历代高僧大德和文人学士事迹，人与寺并写，更显其灵秀气质。今日人们游广化寺，读黄滔此文，定可收获不少文化、文学知识和旨趣。黄滔的诗歌成就也相当突出，如《下第》写其初次落第的悲伤心境，《落花》抒发作者怀才不遇、时运不济之叹，《旅怀寄友人》写晚唐动乱带来的衰败之景，激发了无限愁思。徐夔的赋作，如《人生几何赋》，借曹操《短歌行》之题抒发晚唐乱世士人颓唐悲观的情绪。徐夔所作《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等，远传至渤海等国，人们竟以金书，列为屏障^⑦。徐夔的诗歌如《鸡》《鹰》等篇章，以物喻人，感叹人生。其他如《明妃》《人事》《十里烟笼》等，借王昭君、颜回、北邙山等古人故地，借史咏叹时事，亦为佳作。到晚唐五代，福建作家像王棨、黄滔、徐夔等与中原作家相较仍然不逊色，为后人所称道。王棨、黄滔的律赋，与中原作家相较，亦堪称一流^⑧。

三

宋元时期的福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东方第一大

港——泉州进入鼎盛期。宋代学人每以“海滨邹鲁”来称述福建。邓广铭先生多次申述宋代文化“登峰造极”，福建也是如此。前面已经说到，进入宋代，单是诗人数量，便异军突起，跃居全国第二。宋代文化南移，是个重要的历史现象，特别是南宋，可以说中国文化的重心在福建^①！两宋时期，福建地区出现了一批在政治上有影响或是执牛耳的人物，同时，在文化史、学术史、文学史诸多方面，涌现出一批有很大影响的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学者和作家，如杨亿、柳永、蔡襄、游酢、杨时、胡安国、李纲、张元幹、郑樵、朱熹、袁枢、严羽、真德秀、刘克庄、郑思肖、谢翱等等，真可谓群星闪烁，光华璀璨。在全国范围，他们也都是熠熠生辉而毫不逊色。

宋初的“西昆体”诗派，多唱酬之作，在当时影响巨大，其领袖人物正是浦城人杨亿。杨亿曾坐于宋太宗之侧，即席赋诗，又与王钦若一同主持编修《册府元龟》，政治地位高。杨亿生平所作诗文甚多，有《武夷新集》20卷传世（凡诗5卷，杂文15卷）。杨亿的诗，即使是《西昆酬唱集》中的作品，也并非皆无可取，如《代意二首》，学李商隐的手法，代人立言，以男女比拟君臣，亦颇费用心。杨亿的诗并非都是唱酬之作，也有不少内容充实的佳作，如《书怀寄刘五》《建溪十咏》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诗“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应该还是比较公允的。

北宋崇安人柳永，是中国古代词史上的一面大旗。他的《乐章集》保留了近200首词，有“奉旨填词柳三变”的佳话传世。亦可以说，词这一文学样式，正是到了柳永手里，发生了“三变”，即在形式上变小令为慢词，在内容上变“雅”为“俗”，在语言上变高雅为俚俗。除此之外，柳永在词的表现手法上还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且创用了100多个词调（首创或首次使用）。柳永对于后来词人影响巨大，包括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都受柳永影响。柳永的词如《雨霖铃·寒蝉凄切》《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早已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柳永的诗只留下两

三首，但是《煮海歌》却被钱锺书选入《宋诗选注》，认为与王冕的《伤亭尸》“可以算宋元两代里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⑩，值得注意。

北宋名臣蔡襄，仙游人，勤于政事、精于吏治，又长于诗文，工书画。蔡襄19岁，离家赴京应试，举进士甲科，与欧阳修同榜，名噪京师。范仲淹执政，推行“庆历新政”，蔡襄是他的支持者。至和、嘉祐年间（1054—1063），蔡襄两次知泉州，任上蔡襄于泉州城东郊洛阳江上修建了著名的万安桥，又称洛阳桥，并亲自撰写《万安渡石桥记》，刻碑立在左岸。蔡襄存诗约400首。其时，宰相吕夷简执政，树党营私，排斥异己，屡贬言者。蔡襄看到这种情况，即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赞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等人，斥责高若讷为阿谀权贵的不肖之徒。诗出，汴京士民争相传抄；辽国使者适至，购买数十本回去，张贴于幽州馆舍，于是蔡襄名传北国。蔡襄的诗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如《鄜阳行》），但也不乏清粹的亮色，如《宿延平津》，再如《梦中作》，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有忧世之心，却又无力回天，想要隐居，又难以遂愿的矛盾心情。

南宋偏安江南，面对着金人的入侵，面对着国家的急剧变故、民族危亡，福建作家都洋溢着鲜明的爱国热情，像李纲、李弥逊、张元幹、邓肃、刘子翬等，都是如此。

李纲历仕徽、钦、高宗三朝，累官至丞相，是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李纲的诗和词作，大都抒发了对“社稷生民安危”的忧虑，表现坚决抗金、收复失地的决心，如《病牛》《六幺令·长江千里》《喜迁莺·真宗幸潭渊（边城寒早）》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即以诗文而言，亦雄深雅健，磊落光明，非寻常文士所及。”李弥逊的《次韵学士兄桐庐道中》则是通过侧面描写来抒发自己关心时局的情感。钱锺书《宋诗选注》赞“他的诗不受苏轼和黄庭坚的影响，命意造句都新鲜轻巧，在当时可算独来独往”。像邓肃的《偶成二首》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虽闲中见志，骨气劲道，忧时之忱，溢于言表。刘

子翬的《汴京纪事》反映了作者感时忧国的沉痛情感，堪称一代兴亡的诗史。

永泰（旧称永福）人张元幹，早期生活疏狂放荡，但是在靖康之难中，他投笔从戎，曾协助李纲指挥汴京保卫战。目睹民族灾难，他的词风变得慷慨悲凉。如《兰陵王·卷珠箔》借恨春光流逝，抒写北宋亡国的黍离之悲，《贺新郎·曳杖危楼去》表达对李纲抗金主张的极力支持及对时局的无限愤慨，《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借送胡铨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的“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成为众人熟知的名句。张元幹有《芦川词》存世，存词185首。

南宋时期有一大诗派即江湖诗派，因钱塘人陈起编了《江湖诗集》而得名。据张宏生考证，确定为江湖诗派成员为138人，其中福建籍诗人有20人，包括叶绍翁、刘克庄、严粲、林希逸、敖陶孙等^①。虽然江湖诗派是一个松散的诗人团体，由此也可见福建诗人之盛。莆田人刘克庄是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最大者，被许多江湖诗人视为领袖^②。刘克庄存诗4000多首，诗中突出的感情是不忘故国、不忘收复失地的情怀。他的“少作”《北来人》即将故国之思、希望收复故土的沧桑悲凉心境表现得非常深刻。《苦寒行》写边疆士卒的艰苦和京城世家大族日常生活的奢华，可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相媲美。《军中乐》则通过受伤战士的痛苦来写军中苦乐不均的状况。刘克庄的词作，继承和发扬了辛派（辛弃疾）词的爱国传统。如刘克庄的代表作《贺新郎·北望神州路》，词中谴责南宋政府不联合北方义军进行北伐，讽刺当权者苟且偷安懦弱，抒发作者恢复中原故土的壮志情怀，表现出特别昂扬的爱国精神。再如《忆秦娥·梅谢了》，抒发对中原沦陷区人民命运的关切，表达深沉的爱国感情，鼓舞了历代的爱国士人。

宋代闽籍理学家里也有许多诗人，如游酢、杨时、李侗、朱熹、黄榦等。一般以为理学家轻视文学，也不善诗文。其实到了南宋，情况已有所改变。且看游酢的《水亭》、杨时的《藏春峡》，

并不只重理趣，虽是短制，其状物写景，却也清新可爱。朱熹的《春日》《观书有感二首》，是大家熟知的名篇。朱熹主张“文从道中流出”，也写了不少说理的诗歌，但这两首诗没什么道学气，虽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和“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多少有些理趣在里面，却生动流丽，浅显明白，又形象鲜明，富于情趣。再如《武夷棹歌十首》，描绘武夷九曲胜景，诗中有画，笔端含情，可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景交融，意境深远。朱熹是“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钱锺书语），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三评《武夷棹歌》是“盖道学中最活泼者”，确实如此。

宋代，福建作家的散文创作也是非常丰盛的。宋初欧阳修的诗文革新，对于散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欧阳修自己的古文创作，以韩愈为典范，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种风气，也影响到福建的作家。

宋初汀州宁化人郑文宝，不但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还是一名出色的文学家。郑文宝文采卓然，著述颇丰，又工于小篆。今藏于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峯山碑》即为郑文宝所书，通篇用笔精到圆熟，气韵丰匀，独具风貌，充分体现了秦朝李斯小篆的特点，也代表了郑文宝书法的最高成就。其《书〈峯山碑〉跋》即记载此事。所选杨亿的《驾幸河北起居表》，高度赞赏真宗亲征行动，是杨亿主张抗辽的作品，也是杨亿工整典丽文风的典型。蔡襄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以其创作实际支持欧阳修的古文主张。蔡襄的文章，文气流畅，言简明白，精炼雅洁，有经世之效，又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如《万安渡石桥记》《荔枝谱》。欧阳修称赞蔡襄的散文是“清道粹美”，颇为中肯。李纲的文章，重在议论国是，详明恳切，忠心可鉴。他给宋高宗赵构上《十议札子》，第一篇即“议国是”，文中驳斥当时主和派的各种谬论，逻辑严密，论述详实，是一篇掷地有声的政论文。朱熹的文章，有言事政论之文，也有一些记叙杂文。政论文如《戊申封事》，洋洋洒洒一万多字，条分缕析，透辟剀切。杂记之文，如

《记孙覿事》，可说是一篇讽刺小品，文章很短，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翰林学士孙覿的投降嘴脸。而《送郭拱辰序》，又写得很有情致。读完这些名篇，你就可以知道，朱熹的诗和文，并非都是一副道学家的面孔。

宋末元初的遗民作家中，有两位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就是谢翱和郑思肖。霞浦人谢翱作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与抗元志士，志行高洁峻伟，倜傥有大节，与谢枋得并称，号称“南宋二谢”。谢翱诗文俱工，气节千古，在南宋遗民中又卓然翘楚，影响颇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有较高的评价：“南宋之末，文体卑弱，独谢翱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其惊天地泣鬼神的名篇《登西台恸哭记》，是一篇用血泪书写的祭文，悼念壮烈殉国的文天祥，沉痛悲愤的情感令人震撼。谢翱还写有诗《西台哭所思》，也是悼念文天祥的，哀痛悲切，深挚感人。另一位连江人郑思肖，号所南，字忆翁，现所传名、字与号均为宋亡后改取，有不忘赵宋之意。其所著《心史》，被明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称为“奇书”。其《心史总后序》是郑思肖对《心史》的总结，文中抒发了自己忠于宋室的殷殷之情，同时表达了“国可亡，然志终不可为之屈”的坚贞气节。其诗歌名篇《题多景楼》，“倍怀哀痛”，感情真挚强烈，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以及恢复国土的渴望，再如《寒菊》，以寒菊象征忠于故国决不向新朝俯首的凛然气节，都不失为以真情感人的好诗。元代，还有浦城人杨载，有“元诗四大家”之一的盛名。杨载诗风劲健雄放，歌行体尤佳。其作《雪轩》诗，场景宏大，《塞上曲》描叙大漠风情，雄浑而豪迈。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福建地区的中原化进程加快。在诗文创作上，同样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首先，面对着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现实，他们与中原作家一样，忧国忧民，甚至慷慨赴难，显示出作为一位士人所应有的忠义节烈的悲壮意气。这些福建士人，即使无力回天，也以诗文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与情操。杰出的代表有李纲、

谢翱和郑思肖等人。其次，福建作家已经在中国的文坛上或是成为执牛耳的人物，如杨亿之于“西昆体”；或是开创了文学创作新的一页，如柳永之于慢词的创作；或是在重要流派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支劲旅，如在豪放词的大声合唱之中有张元幹等福建作家。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对盛唐及唐前诗歌创作的全面总结，同时在方法论上，其以禅喻诗的主张，对后世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在诗文创作上，可与中原作家比肩而毫不逊色。这些，体现了福建作家的开拓精神。第三是在地域的分布上显示出均衡性。八闽大地都有作家涌现，这也说明诗文创作更加普及化。可以说，两宋时期的福建文学创作，成为彪炳于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四

就诗文创作来说，明清时代与宋代相比，福建似乎没有像宋代那样，出现众多的一流作家和诗人，但是仍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看似平稳发展中激荡着风云变幻。明初出现的“台阁体”诗风，作品以“颂圣德，歌太平”为主要内容，多为应制、酬赠之作，诗风雍容典雅，又因其代表人物是馆阁名臣而产生很大影响。这代表人物“三杨”中，就有闽人建安（今建瓯）杨荣。今录杨荣诗《蓟门烟树》《江南旅情》，写景栩栩如生，景中含情，虽温雅平和，却也情感真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杨荣的《杨文敏集》说：“平心而论，凡文章之力、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卷一百七十）还是有道理的。

明代初期，由元入明的诗人张以宁、蓝仁、蓝智兄弟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古田人张以宁，主要以诗名家，有《翠屏集》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五言古体，意境清逸；七言古体亦遒警……体皆清新”（卷一六九）。其《峨眉亭》诗，写在峨眉亭饮酒遣怀，想起李白醉酒捉月而亡之事，感慨万千，抒发才学不见用于世的心中郁闷。《闽关水吟》写自己的思乡之情。全诗设譬精巧，想象新奇，表现出很高的抒情技巧。再如《丝瓜》，是

一首咏物诗，作者以干枯老去丝瓜的绦丝形象比喻纠结缠绵的愁怀与秋思，极其贴近自然。崇安人蓝仁，多作山林田园诗，如《西山暮归》《次云松长山道中》等，颇得王维山水诗的风致。

南宋时期邵武人严羽著《沧浪诗话》，提出“以盛唐为法”等一系列理论命题，为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前后七子之前，以福州地区诗人“闽中十子”为核心的闽中诗派，论诗宗法盛唐，也是受到严羽影响的。闽中诗派的领袖林鸿，福清人，主张作诗要以盛唐诗为范本，其诗《出塞曲》《塞上逢故人》均可看出这样的特色。闽中诗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高棅，著《唐诗品汇》，依照严羽的思路，首倡唐诗分期为初、盛、中、晚，特推重盛唐，也是延续了严羽的主张。高棅入京前所写大量诗歌，大多描述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写得好的可与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柳宗元诗歌相媲美。《题台江别意饯顾存信归番禺》《得郑二宣海南书札》《衡江夕露》几首可见其特色。明代还有几位诗人，其作品也是有影响的。闽县人郑善夫，诗学杜甫，多忧时感事之作，寄托深沉之思，气盛格高，可谓得杜诗之骨。闽县人徐燧，论诗“不离三唐格调”，反对“野狐外道”“华楚奇险”，其七绝如《邗亭残花》《芋江驿楼送张四之白下》等最能代表他的成就。侯官曹学佺，是著名学者、诗人，清兵攻陷福州，曹学佺自缢殉国。曹学佺诗有盛唐之音，其诗如《木渚》《新林浦》等，浅淡情至，是为佳作。明代嘉靖中期，福建面对倭寇的侵扰，这一时期，晋江人俞大猷、连江人陈第，都写了不少抗倭的诗作。如俞大猷的《舟师》，歌颂了抗倭将士昂扬的士气、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陈第的《赴援右北平》，展现将军的气势，字里行间带着战场的悲壮与刚冷。明末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南明文学家、漳浦东山（旧称铜山）人黄道周。黄道周是著名学者，他抗清死节，义薄云天。现存诗2000余首，特别是他被俘后在牢室中所作300多首诗，出自忧愤，最为感人。今入选的几首诗，足可见其气节。此外，明代遗民作家像福清人林古度、宁化人李世熊、莆田人余怀、侯官人许友等，都留下了不少眷怀故

国、感叹时世的诗篇。

明代的古文创作，也走着复古的道路，从前期的模仿秦汉古文，到推崇唐宋古文，特别是“唐宋八大家”。活动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唐宋派，他们提出一套与复古派相对立的散文理论，推崇唐宋，主张由唐宋而窥西汉、先秦，其首领人物就有晋江人王慎中。王慎中对宋代的曾巩最感兴趣，其《曾南丰文粹序》从“极盛之世”“周衰学废”“由三代以降”“由西汉而下”及“至于今日”五个阶段，系统论述文与道的关系，是其批评理论的代表作。王慎中的《海上平寇记》描述俞大猷海上平寇的事迹，为世传诵，《游清源山记》，深得欧阳修《醉翁亭记》之神韵，堪称王慎中散文中的佳作。晚明时期的李贽，不但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其承袭老子“赤子之心”的哲学思想，提倡“童心说”等文学主张，提出创作要“绝假纯真”，要表达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感情，对公安三袁等有重要的影响。李贽的散文创作，像《赞刘谐》《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都可以看到他大胆的叛逆的思想。晚明长乐人谢肇淛，其诗在当时即颇有影响。谢肇淛博学多才，著述宏富，著有《小草斋集》《小草斋诗话》《五杂俎》等，是明末著名学者。笔记著作《五杂俎》对明代的政治、社会、文化、风俗有详细的记载，并因“夷夏之论”触到了清统治者的痛处，曾被列为禁书。今读其书，仍可感受到他对历史和时局的独到见解。

进入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风行一时，清人的诗歌创作又有一番新的面貌。诗人并不是一味地追踪盛唐，而是抒写性情，标举神韵，各显特色。清初长汀客家人黎士宏，作诗主张情至境新，其与入闽著名诗人周亮工交情甚笃，所以其《托素斋诗集》中有许多有关周亮工的诗，表现出朋友间的真情。此外，如其《闽酒曲》组诗，写的是客家风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侯官人张远，颇有诗名，其诗古近体皆备，尤工古体，诗风奇峭秀异、清新雅丽。其诗《下建溪诸滩》写建溪之险，在自然景观的描写中蕴含着对人事变迁的思考，气势宏大，雄伟壮观。清代闽中诗